

云南 抗战时期 文学史

蒙树宏◎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

蒙树宏◎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易 山 黄显松

封面设计：向 炜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

蒙树宏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184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5-1461-6/K·20 定价：11.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综述	17
第一节 “文协”云南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7
第二节 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其活动	20
第三节 文学副刊、期刊、丛刊	24
第四节 1937~1944 年纪念鲁迅的活动	42
第五节 文艺与抗战	47
第六节 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	51
第七节 文学论争	54
第二章 诗歌	59
第一节 概况	59
第二节 彭桂萼及其创作	63
第三节 冯至等西南联大诗作者群	69
第四节 杨明、邱晓崧的诗歌	80
第五节 罗铁鹰、包白痕的诗歌	85
第六节 雷溅波的诗歌	91
第七节 光未然在云南	94
第八节 穆木天在云南	98
第三章 小说	104
第一节 概况	104
第二节 李广田和他的创作	107

第三节	白平阶、宣伯超的小说	117
第四节	西南联大小说作者群	124
第五节	马子华的小说	130
第六节	周轲、李寒谷的小说	136
第四章	散文	141
第一节	概况	141
第二节	楚图南和他的散文	149
第三节	沈从文在云南	155
第四节	张天虚和他的报告文学	165
第五节	张子斋和他的杂文	170
第六节	王了一及其《龙虫并雕斋琐语》	175
第七节	费孝通及其《鸡足朝山记》	181
第八节	缪崇群及其《石屏随笔》	184
第九节	李乔、张镜秋的散文	187
第五章	话剧及其他	193
第一节	概况	193
第二节	石凌鹤及其《梦的微笑》	195
第三节	陈铨在云南	198
第四节	徐嘉瑞及其著作	204
第五节	范启新·陈豫源·王秉心	211
第六节	话剧演出	214
附录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大事记	220
后 记		271

绪 论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相继失守，国际通道被截断。1938年8月通车的滇缅公路（1942年5月因滇西沦陷而停运），成为国际大宗援华物资输入的惟一通道。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又使昆明再次成为国际交通的枢纽。整个云南，是我国抗战的大后方，1942年以后，又成为抗战的前线。

其次，云南地方当局和重庆的中央政府有矛盾。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龙云以昆明行营主任的身份，不允许中央系统的宪兵、警察在昆明市内执行任务，他们对进步人士的逮捕计划多次被挫败。进步势力利用这种情况展开多方面的活动。抗战后期，随着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以及龙云于1944年底秘密地加入民主同盟，就更有利于发展进步力量，从而使昆明被称之为民主堡垒。

这种地理位置和政治情况，突出了云南地位的重要性；也有利于云南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云南现代文学繁荣兴旺的时期。在抗战期间，昆明成为和重庆、桂林鼎足而三的文化中心。

抗战时期的上下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抗战时期，上限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狭义的乃指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抗争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为止。本书一般采用狭义的上下限，但就云南的具体情况来看，抗战时期文学实际上在1945年9月以后还延续了若干时日，到西南联合大学复员以后，才真正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某些章节论述的下限就移到了1946年5月。至于评介作家时，把他这段时间的创作和他一生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作纵向的考察，这自然就不受抗战八年的时间限制了。

云南的这段时期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七七”抗战而终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从总体来说，这是上升的阶段，文学阵线相当活跃，报告文学和通俗文学蓬勃发展，新诗发出了高昂的呐喊声；特别是在1939年及以前，这一特点十分明显。皖南事变以后则不同：政治压力加剧，白色恐怖严重，作家生活困难，心情苦闷，文学界的活动趋于消沉，连“文协”昆明分会也陷入了“打盹”的状态。报刊所登载的“多半是享乐式的小品或散文”，而鼓吹英雄崇拜、超人哲学的“战国派”文学也猖獗了一时。这是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44年中期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为止，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尽管生活艰辛，政治迫害仍然严重，但民主运动高涨，作家的心态积极，云南文学界开始了苏醒。这一变化，楚图南在1944年元旦时已有预感。

他说，学术与文艺的“转捩点似乎已经来到了”。从此以后，文艺战线的斗争加剧，作家从消沉、苦闷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在理论领域，开始自觉地宣传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强调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政治讽刺诗和战斗的杂文大量产生；众多的创作，表现了对黑夜的决裂和对黎明的追求，表现了对“山那边”新天地的向往。总之，这时，文学界在奋起，呈现出一股活泼、雄健的朝气！闻一多在《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中曾说：“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证明它是不容低估的。”

二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艺术从十年动乱的噩梦中觉醒。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从1981年起，组织并指导文艺工作者有计划地征集文献、资料，编写出《云南省志·文学志·现代文学》等；云南大学也成立了抗战文艺研究室，于1987年编印了《昆明抗战文艺研究通讯》。抗战时期文学界的成员，如马子华、李乔、龙显球、包白痕、彭桂蕊等，纷纷撰写回忆录，提供了丰富的史实或者查考的线索；相继出版的《楚图南著译选集》、《张子斋文集》、《艾思奇文集》、《柯仲平诗文集》、《徐嘉瑞诗词选》、《词与音乐》、《滇南散记》等著作，当中均有不少为抗战时期的作品；内部印刷的《留芳集》、《磨剑集》、《雪之家》、《蛾的追求》、《雪泥上的鸿爪》等，保存了抗战时期濒于散佚的作品，或把零散的作品集拢起来，便于查找和研究；王琳、杨苏、张维分别为柯仲平、艾思奇、李广田写传；此外，还有一批人对我省抗战时期的文

学进行史料发掘、整理或加以综述、研究，如黄茂槐、李生勉、熊朝隼、蓝华增、任兆胜、陈思清等。可以说，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一) 文学回忆录的严谨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张子斋在《关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一封信》中曾说：“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革命活动，人殊言异，歧见不少：你一篇，我一篇，他一篇……这样的资料数量愈多，混乱和困难亦愈大……统一思想，端正态度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的回忆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如抬高自己，或者同一执笔者对同一事件、人物的回忆，前后出入过大等等。又如把《警钟》季刊创刊的时间说成 1938 年秋（实为 1938 年冬），把《诗与散文》的诞生时间说成 1940 年严冬或 10 月 10 日（实为 8 月 1 日），说《晨墩》只出版了两期（实为 5 期）等等，虽然不是态度、思想的问题，但不够严谨却是事实。我们不应要求回忆者之所述都是信史，那是很难办到的，而且，这样要求容易束缚回忆者的手脚。但是，对记忆有些模糊、拿不实在的地方，应加以说明，或加上“可能”、“大约”、“似乎”等字样，这才是对于历史以及对读者的一种严谨、负责的态度。

(二) 研究队伍比较小，而且大多数人的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因此，有些领域和不少问题就没有人研究或研究得比较肤浅。例如：陆晶清、张天虚、桂涛声等，就长期被人们遗忘。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就说：“一个人做事不专……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研究云南

抗战时期文学的人，要找资料、阅读资料、抄录资料（因为有些不能复印）、排比卡片、研究资料，从准备、酝酿到执笔为文，事必躬亲，很少依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加上不少领域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要触类旁通也很不容易。

（三）史料残缺。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多为土纸本，保存困难。所以，报纸、刊物残缺者甚众，书籍也有类似情况。人藏不全的情况不说了，有些根本就完全缺失（起码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如刊物《时代轮》、《金碧旬刊》，书籍《火中的缅甸》、《缅战随军回忆录》（均属报告文学）和《金丝鸟》（诗歌）、《梦的微笑》（话剧）等。研究者对这些只好略而不谈，或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加以介绍，这就可能发生缺陷或出现差错了。

（四）和上述情况有关，有些综述性或研究性的文章，就会出现一些经不起深究、核查的史实和结论。有时，由于辗转引用，似乎多人赞同的史实，也实为以讹传讹，并不足信。回忆文章偶尔出现差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因为回忆者年事已高，对久远之事记忆已经模糊，加上精力不足，不可能一一访查核实，我们不必苛求。但是，我们引用这些回忆材料，就必须认真地辨别，慎重地选择。在抗战时期，张子斋和杨季生都使用过“浪萍”这一笔名，杨东明、张子斋又都曾署名“孤帆”，如不仔细分辨，就会张冠李戴。同时，对纷纭的文学现象要加以分析、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一般地铺陈史料；进而要发现若干规律性的东西，使著述具有理论色彩。而这些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是需要付出极大劳动才可能获得成效的繁重而困难的任务。

上述任务的完成，有赖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努力。首先，要

重视资料工作。它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没有必要的可靠的资料，研究工作就如沙上建塔，容易倾覆，劳而无功。史料残缺或人手困难，这是事实，但穷搜博采，总会有收获。如《战国策》这一刊物，人们批判它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这自然是对的，但并不全面，因为该刊发表的文章有些也和统治者发生矛盾，对他们有所讽刺。因此，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该刊第五期的送审稿《从大政治看宪政》、第十三期的《政治与幻想》、第十七期的《浮士德游中国》、第十八期（没有出版）的《吏治重于民治》和《猪肉文化》分别“指示修正”、“不准刊行”或被查扣。另外，1940年7月，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38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对《战国策》“应予警告”。可见，该刊和掌权者之间不完全是一心一德，有其矛盾的一面。有些研究者可能因为掌握的资料不全面，导致立论发生偏颇。其次，要重视宏观的考察。文学现象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以及与历史、时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研究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时，要注意历史的承传性，将其摆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认识。就一位作家来说，研究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应注意他在抗战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作纵向的研究，才能理清其创作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应重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横的联系，即作家之间的比较以及文学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之间，即和经济、政治、军事等等的消长起伏的内在关系。譬如说，在1942年，昆明的一些刊物大量登载软性的文章，有些编辑还提出唯美主义的口号。这就要联系社会情势加以说明。一方面，这和国内政治的黑暗、气氛的窒息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占领了滇西，滇缅交通中断，“从前活动于滇缅路上的人，需要用适应其需要的文化享受来驱除过去

的枯涩……无处安放的资财，也不妨用一部分来作文化投资”——投资者要求刊物为他们服务，这就是作品趋向“唯美”和消遣享乐的重要原因。总之，我们绝对不能鄙薄理论，在注意文学的纵的、横的联系的同时，也注意作家的个性、心理素质、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才能对研究对象作出中肯的评价。

资料工作、宏观考察，这偏重于个人的努力。但是，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化，还有赖于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都是有的，如刊物给发表研究成果，各单位、学校的组织领导，省教委拨给研究经费等等。当然，这些支持也还有待加强。我省抗战时期文学的研究，尚有计划性不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等弱点；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过关于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的专书，这和四川、桂林等地区比较^①，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三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在抗战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少数人当了汉奸，为全国人民所不齿；而国民党政府则在抗日、降

^①四川有《抗战文艺研究》(季刊)，出版了《抗战文学概观》和“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含《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大后方戏剧论稿》及《“战国派”(一)(二)》等)。桂林出版了《桂林文化大事记》和“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含《文艺期刊索引》、《桂林文化城概况》、《西南剧展(上、下)》等)。在资料工作的基础上，他们还编著了《桂林抗战文学史》和《桂林抗战文艺概观》。

日之间摇摆（但它的官吏、将领中，有一批人是坚决抗日的），实行两面政策。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和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因此，在政治、军事、思想上，在文化、文学领域中，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领导权之争。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在一开始就力图控制领导权。他们想把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据为己有而未如愿，拉拢威迫失效后，就以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以统一指挥、集中力量为借口，将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裁撤。1938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云南分会成立，省党部派张友仁来“指导”，以后又占据了理事职务并和省党部的甘玉霖一起掌管着分会的宣传部。张友仁和省党部委员分别出面组织了云南歌咏协会和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昆明分会的筹备会。由省党部等党政机关所直接控制的剧团即有国民剧社（国民党）、青年剧社（三青团）、国防剧社（滇黔绥靖公署）等。在西南联大，也挂起了“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区党部”、“三青团中央西南联大直属分团”的招牌，出版《当代评论》（区党部负责人陈雪屏主办，三青团中央团部拨发经费）、《云南青年》（三青团云南支团部宣传组编辑）、《大学论坛》等刊物。更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了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直接控制的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迫结束）。这一组织和省教育厅，乃是云南省掌管书、报、刊的印刷、发行和教育、思想工作的机构。

但是，拥有政权、金钱的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并未能牢固地拥有领导权；连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也有中共党员进入，特别是它们的副刊，基本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掌握。进入《民国日报》的共产党员

有刘浩、严达夫、侯方岳、王以中，进入《云南日报》的就更多，先后有杨东明、张子斋、姚黎民、李何林、陆光亮、何宏年、李立贤、李立昆；一段时间之内，还由唐登岷（任书记）、刘惠之、杨亚宁、蒋南生、欧根组成党的支部。个旧的《曙光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实权也掌握在中共地下党手中。此外，昆明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正义报》、《观察报》、《朝报》等，均有中共党员和进步的编辑、记者在其中工作。

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在抗战时期，曾经以昆明支部、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和云南省工委的名义进行活动。由于当时的环境和特殊情况，工作重点放在统战、军队和工会、青年、妇女方面，但对文化、文学方面的事并没有放松。1937年10月，中共昆明支部创办机关刊物《前哨》，主编即为该支部负责人李群杰（署名揭腐）；同于10月问世的《南方》，是以群众的面貌出现的党刊，在呈教育厅文中所署的负责人邱晓崧、龙显寰、李建平均为党员，马子卿参加云南省工委领导工作以后，也进入编辑部，并以冯济民和麻涤非为笔名，为该刊撰写社论和文章。董必武曾对《南方》的办刊方针作了指示。1939年初，成立了由李剑秋任书记的中共昆明文化支部。它的《工作计划大要》规定了任务、组织、宣传的工作要点，如“要扩大党在云南文化界的影响积极的起领导作用”，“组织文化团体内的党的核心小组”和“推进《文化岗位》，使成为新启蒙文化运动、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刊物”等。此外，中共云南地下党还领导了众多的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如：

1942年7月，由刘浩、欧根为主体发起组织昆明外勤记者联谊会（11月正式成立）。

1943年9月，滇军第十八师成立文化艺术工作队，由朱家璧（中共中央于1941年初把他从延安派回云南）任队长。

1944年春，由南方局派来云南从事统战工作的华岗、周新民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并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

1944年9月，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刘浩通过张光年等人的关系，酝酿和促进了“文协”昆明分会的改组，从而结束了它的“打盹”状态。

总之，在抗战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是在和违背抗战到底的妥协投降的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的领导的。同时，党也对自身的右的和“左”的倾向作斗争，但主要是反“左”。1939年初，马子卿在《巡视云南报告》中就说过：“云南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的危险。”该报告所举的例子有：一是安宁学校的历史教师，在历史课中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在德育课上讲《论持久战》，“他们像要把它办成一个抗大，可是事实上比抗大还要‘左’；二是在批判钱端升、罗隆基的失败情绪时，“没有把真正的汉奸和认识不清的分子分别对待，……态度上失之偏狭和过火”。在文艺上，有人犯“歌咏第一主义”，只是为唱歌而唱歌，这是右，但主要的错误仍是“左”，如粗暴地否定一些作品，把《雷雨》、《日出》、《原野》等简单地斥之为“纵欲的悲惨结局，沉沦的娼妓命运，报私仇后的恐怖灭亡”，认为是“埋伏在昆明戏剧界里面的毒素”。

四

云南，从其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成分和地理环境来看，是颇具特色的。这一特色，在抗战以前即被就读于省外的文学青

年，如马子华、李寒谷等所发现。他们通过寓居地和家乡风情的对比而产生强烈的感受，因而鼓起了他们执笔为文的热情。这一特色，也引起省外作家的注意，他们根据在云南的生活体验，写下了富有云南乡土味的《漂泊杂记》、《南行记》（艾芜）和《普姬》、《爬梯》（蔡希陶）等。这些作品，都成了云南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作者被巨大的爱国热情所鼓舞，民族存亡是人们关心的头号问题。不少文学青年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去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而呐喊。这时，作者更多考虑的是抗日的共性，至于题材的鲜活、人物心理深层的发掘、语言的个性化、作品的地方特点以至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就不怎样着重考虑了；甚至有人“以想象的远方的轰轰烈烈的战争故事，或传闻和记录下来的惊心动魄的战士生活，作为创作的内容”（《刁斗集·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显得空泛，存在着公式化的倾向，缺乏感人的力量。

1938年10月开始，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失守，人们从战争初期那种亢奋状态逐渐转向深入的思索。作者在思考文学深层次的报国之道。他们不再满足于政治热情赤裸裸的呈露，不再片面追求血光火海的战斗场面；在思考文学思想内容的同时，重视其艺术性，重视文艺的地方性，重视它的乡土特色。

在抗战时期，从理论上强调文学的乡土特色的，在云南，最早是穆木天。他在《南方》第十期上发表了《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一文，说云南的“社会生活，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殊性。一个云南的抗战文艺工作者，就是把握这一种特殊性，而从事他的典型描写”。楚图南也密切注意这一问题，他在

《昆明周报》创刊号上的《抗战文艺的战斗性和地方性》一文中就指出：“把握了文艺主题的地方性，不单是可以克服了文艺的公式主义，也更能增加了文艺的真实性，使文艺的内容更其充实，活泼，对于读者有更伟大的效果和影响。”张光年于1943年6月，在《新地文丛》上提出“描写云南”的口号，1944年2月，又在《高原文丛》上发表《云南生活——地方色彩和地方性格》一文，说“地方色彩是通过对于主题和形象的完满表现以后所自然放射出来的光彩”；“所谓云南性格，是指的复杂多变的云南生活的总和”。此外，杨亚宁、周轲、彭桂萼对这一问题也给予重视。

在创作上，在这个阶段中，最早体现地方特色的，是李寒谷主编的《文艺季刊》，它先后发表了《耳朵》、《劫》、《贩烟土的一群》、《石碑山的火》，其中的若干篇，评论者认为“人物有云南本色”，体现了“优美的地方色彩”。彭桂萼的《边地之边地·照相机》、微明的《云岭的脉搏》和《云南日报》的“我们怎样开筑滇缅路”特辑等都有浓郁的云南风味。在这方面，白平阶、宣伯超、马子华的贡献尤为突出。

在创作中描绘乡土特色是很重要的。1934年4月19日，鲁迅在《致陈烟桥》中就说：“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但是，作家不能只着眼于“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应当强调“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语）；“要能写出人类的爱与憎”（沈从文语）。这就要求作者“注意社会意识，有社会意识，文章才有意义，有价值，不然光写乡土，那不过是些新闻罢了，怎能动人呢？”（《孙席珍致寒谷》）上述种种意见，有关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注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足之处在于有些作品注意了地域性、民族性而忽略了时代